

改革开放40年让我终生难忘的公事、私事

生命学院退休教师 郑兆鑫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这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伟大事件。它使文革结束时濒于奔溃的中国经济获得新生，使亿万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整个国家也逐渐强大起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正好参与其中，目睹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私事公事经历不少，有很多已经淡忘，但有一些事尽管很小，但仍然记忆在脑海之中。

第一件事出国学习，1977年，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要扩大派遣留学人员”。从此拉开改革开放后大量送留学生的序幕。第一批是1978-1983，据说公派约三千余人去欧美日等先进国家进修。我便是其中之一，于1979年9月赴瑞士日内瓦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进修。记得是9月12日晨，乘CA943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去瑞士苏黎世。其中有12名中国留学生，11人去英国，只有我去瑞士日内瓦。当飞到新疆穿过帕米尔高原，一只引擎出现故障，只能在伊朗德黑兰着陆，当晚将我们200位旅客送到一家大宾馆住宿。该旅店设施很好，其豪华程度在当时的上海也不多见。饭后在房间内看到令人羡慕的21寸大彩电，复杂的淋浴器我们仔细琢磨了一番才知如何使用。当我到达日内瓦后看到整齐干净的街道，家家拥有的轿车和多姿多彩的别墅小楼。进入超市《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类新型可以自选的巨大商场》看到极为丰富的各色商品，彩色电视排在一起犹如一堵五彩缤纷的幕墙，各色商品玲珑满目。这些商品来自世界各地，但是可惜，来自中国的商品却非常之少，几乎没有。我仅看到一堆极为廉价的布鞋堆在一起，任人挑选。刚跨出国门的冲击已使我看到什么是现代发达国家，我们和他们相比经济上差距多大，深感中国已经落后了。我工作的理学院第二科学楼内有几个系，但是中国人只有我一个。我坐在楼下咖啡厅吃饭时，常有些热心人和我交谈，总是

问我您是日本人吗？我回答说“不，我是北京来的中国人”。他们总是惊讶的说“啊北京来的，从未见过”。我记得一次星期六下午我和老董，老樊三位中国留学生坐在日内瓦老城的一个小咖啡馆里聊天。偶然见到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是老董的上课老师，和我们坐在一起交谈起来。从中国人的经济状况谈到中国的风俗民情，从中医中药谈到神奇的针灸，从历史谈到现代政治，兴趣极为广泛。起初只有我们四个人，谈着谈着，旁边的茶客也来洗耳恭听，最后小咖啡馆中的十多位客人都移坐到我们周围说，“你们的谈话太有意思了，让我也参加吧”。他们提了很多为什么。有一位先生说“中国回到世界上来太好了，这几十年中国人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和世界隔绝呢？”老董说“不，先生，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中国和你们瑞士一样存在这个地球上。只是自从朝鲜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责任不在中国”。茶客们纷纷点头称是。这次偶然地聚会使我感到西方世界人民是友好的，他们迫切希望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当时我坚信中国会打开大门，让中国公民能方便地走向世界。在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微不足道，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比中国的经济总量高11倍，中国人均GDP只有220美元。我们很穷。记得1981年我总结了日内瓦大学研究工作，在Nucleic Acid Research杂志上发表以我为第一作者的分子生物学论文。按当时习惯作法，关心该领域的研究者会写信给第一作者索取单行本。由于1981年底我已回复复旦大学。从礼貌来说我应寄单行本给索要者。但是我个人不能寄，必须通过校外事办公室，开始外事办回我因邮件数量多，国外邮件化费大不能寄。多次交涉才勉强同意。说明当时经费非常少，国家很穷啊。其后1990，1993和1995我作为访问教授.去日内瓦大学开展合作研究。1995年是我最后一次去日内瓦工作。回国前夕，我又一次到日内瓦湖边大道散步，当时去欧美的中国人数已飞速增长。正好遇到几位讲上

海话的青年人。我主动和他们交谈，才知道是刚来日内瓦大学的研究
生。我问他们对日内瓦的印象如何，他们毫不介意的答道：“日内瓦
湖是美，空气也新鲜”。“其他呢？不觉得和上海差别很大吗？”我
追问道。“没有什么差别，和上海差不多。我真有点失望！没有我们
上海繁荣”。我进一步追问道：“你们不觉得日内瓦的商品和生活设
施更丰富更好吗？”“差不多吧”。他们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还有一
位青年轻人告诉我想买一些礼品送给家里人，但是逛了几次商业街也
找不到理想的，因为凡是价格不高款式合适的商品，仔细看看几乎都是
Made in China带回去好像是中国买的，不好意思。记得那天我回到
住处，久久不能平静，感受多么不同的两代人啊！夜已深了，我打开
收音机，又听到日内瓦的一个私人英语台播放美妙动听的经典乐曲。
音乐中断后，传来一段令我兴奋的广告：“欢迎来学中文！欢迎来学
中文！懂得中国话方便去中国旅游，到经济增长最快的中国去做生
意”。这就是改革开放的18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深入展开时的情
景。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上升为世界第二，已达到美国经济总量
的60%，人均GDP已达9000美元。该年11月我又一次去法国、瑞士、
意大利和德国旅游。几乎每个景点都是中国游客为主，免税商店总是
充斥着中国人，店员有华人也有白人，而且都会说华语。不少人一掷
千金，出手大方，几千元一个箱包一买就是5-6个，买十万元一个的
手表就像小菜一碟。我心里是五味杂呈，我为中国富强了，美梦逐步
成为现实而兴奋骄傲。也为国人的浮躁感到不安。

第二件事 中国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建立

1983年国家计委研究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做出一项重要
决策，就是要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任务是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

研究，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第一批被选中的有五个实验室，其中第一个批准建立的就是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能落户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不是偶然的，这是以谈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老教授在学术上远见卓识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的教授们就决定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全面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为了开展分子水平研究一是要培养人，尽量多派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同时邀请国外专家如James Bonner等来学校讲学和传授试验技术。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当时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外汇更是少的可邻。为了建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购置一批价格昂贵的仪器设备。正是谈先生用他的影响，在1979年得到Beckman公司价格优惠，成功购置5件大型仪器和一些必备设备。由于有了这批设备才使得遗传所比国内其他大学更早进入分子水平研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老师如李致勋教授带了几位青年教师奔忙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在教育部科技司的领导下进行大量调查研究，提出多项规划。使国家计委、科技部了解复旦大学的科学研究状况。记得立项评估时由国家计委和教委主持，以李载平教授为主席，组织十几位国内知名专家进行评议。我代表复旦遗传所做立项申请主题发言，我们已能清楚说明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方向任务，已有的研究基础，正在进行的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项目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当时就得到评委们好评，1984年就被计委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首批经费大约是140万美元，共400多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国力之下，确是一笔巨大投资。我们在1-2年内购置一大批先进仪器设备，基本上达到欧美国家一般大学的工作条件。由此而导致的重要效果，首先是具有从事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实力，在其后科学规划中，我们承担十多项国家生物技术攻关和863高技术任务，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其次是吸引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

尤其是复旦早期派出的访问学者80%以上都先后回国。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决心为发展中国生物技术贡献力量，这一批人可以说是第一批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批人也是后来复旦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至今全国已建立一百个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但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仍然是中国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力量。现在回想起来谈老先生等老一辈专家，在1979年便开始规划分子遗传学研究确是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大势，为了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而制定的发展规划。该计划对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形势将产生巨大影响，生物医药就是中国制造2025中十大产业之一。可以预见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将会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现做出贡献。